“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

2015年11月17至18日，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主办，英国大英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更名）、宝丰县人民政府、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协办的“汝窑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敬胜斋和北京康铭大厦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开展的“五大名窑”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为配合会议，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出席研讨会的有正式代表60人、列席代表近40人，有25位代表作了学术发言‹1›。

研讨会开幕式上，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青云先生首先发言，他们分别结合各自数十年来在汝窑研究方面的经验，盛赞了汝窑青瓷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也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通过共享新资料和新的学术成果，共同推进汝窑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分别就传世汝窑瓷器及其数量、汝窑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发掘、汝窑的性质及贡御时间、汝窑瓷器的用途及定名、汝窑与其他窑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　传世汝窑瓷器及其数量

中国古代瓷窑通常以其所在的州命名，广义的汝窑是对宋代汝州境内瓷窑的统称，狭义的的汝窑即宋代汝州辖区内专门为北宋宫廷烧造天青釉瓷器的瓷窑。历代文献记载的汝窑也多指后者，有人称之为“汝官窑”。

由于烧造时间短且烧成难度大，汝窑瓷器在南宋时期已有“近尤难得”的记载，流传至今的更为有限，以往一般认为只有六七十件。为配合“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和此次研讨会，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对世界各地收藏的传世汝窑瓷器进行了重新梳理，最新统计结果是90多件，其中台湾“故宫博物院”21件、故宫博物院20件、英国大英博物馆（含大卫德基金会）16件、上海博物馆9件，其他公、私立博物馆20余件。尽管统计不可能做到全部涵盖（如此次会议上有学者又提供了个别线索），但如果说传世汝窑瓷器不足百件，应该争议不大。

‹1›　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古资料的增多以及对历史文献、图像等更深入的解读，学界在汝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新进展。不过，由于对部分问题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为便于理解和行文统一，本文在背景陈述时仍暂采用一些传统提法，而具体到某位专家、学者发言内容时，再提及其观点。

耿东升先生、小林仁先生、陈恺俊先生分别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以及美国四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汝窑瓷器。他们展示了这些藏品各角度的细节照片，对其具体面貌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关于藏品来历、流传经过的缕述，让与会学者对这些产品及其背后的收藏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据耿东升先生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汝窑圆洗两件，均为清宫旧藏，系1958年借自故宫博物院，器物流传有序。小林仁先生谈到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汝窑水仙盆原为安宅家族旧藏，曾两次由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第一次拍卖是1959年3月17日，以2200英镑成交，并于1960年出现在英国东方陶瓷协会（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举办的“宋代艺术展”（The Arts of the Sung Dynasty）；第二次拍卖是1970年2月24日，以46000英镑成交，由英国古美术商John Sparks Ltd.卖给安宅产业股份公司，创造了当时古陶瓷界拍卖的最高记录。2014年12月，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与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川见典久先生合作对该水仙盆口沿包镶的金属釦进行了初步测试，证明其材质为铜。

德国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的陈恺俊先生介绍了四件美国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瓷器，分别是费城艺术博物馆藏圆洗、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圆洗、波士顿美术馆藏酒盏托盘、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盘。费城艺术博馆收藏的汝窑圆洗是由William Crozier将军遗孀于1944年捐赠的，底刻乾隆御制诗。Crozier将军在19世纪80年代参与过美西战争，1900年时在八国联军任职，此洗可能为当时获得。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汝窑圆洗是由John L. Severance基金于1957年捐赠的。John L. Severance曾是南京大学董事，可能与中国有不少来往，而其表亲Emily Severance还曾与马克·吐温一起到远东旅行。至于此件汝窑瓷器是如何被Severance先生收藏的，尚待进一步检索其家族档案。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汝窑酒盏托盘是John Gardner Coolidge遗孀于1951年捐赠的。John Gardner Coolidge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玄孙，他本人于1902到1906年曾以美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长居北京，这或许可为此件酒盏托盘的递藏提供线索。Coolidge先生热爱收藏，他去世后，家属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陶瓷器96件。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盘原为Samuel C. Daivs的藏品，1940年他去世不久后，被捐入该馆。1893年，Samuel C. Daivs于毕业旅行中，对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Daivs先生结识了中国古董商卢芹斋，并与其交往了20余年。Samuel C. Daivs的收藏主要来自卢芹斋，卢还曾就Daivs先生的藏品举办过3次展览（1935年、1936年、1940年）。此件汝窑盘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卢处购得。

二　汝窑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发掘

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汝窑产品和汝窑遗址的认定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从明代收藏古董之风日渐兴起到清代，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包括汝窑在内的宋、元名窑瓷器的鉴赏、品评，古人对汝窑青瓷“香灰色胎、天青色釉、玛瑙入釉、冰裂纹片、芝麻挣钉”等基本特征的认识逐渐形成，但对汝窑的鉴别仍存在混淆和偏差。台湾“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女士在发言中特别关注了乾隆皇帝对汝窑瓷器的鉴赏观和识别历程，她透过21件题刻乾隆御制诗的汝窑瓷器（台湾“故宫博物院”13件、故宫博物院3件、大英博物馆2件、大卫德基金会2件、香港艺术馆

1件）和绘制于乾隆朝的陶瓷图册《埏埴流光》、《燔功彰色》、《珍陶萃美》等材料发现，在乾隆皇帝识别汝窑的过程中，存在以汝窑为汝窑、以汝窑为北宋官窑、以汝窑为修内司窑、以汝窑为钧窑、以汝窑为章生二窑，还有以钧窑为汝窑、以南宋官窑为汝窑、以乾隆官窑为汝窑等复杂多变又纠结不清的认知。她指出，“一箱传自雍正朝的汝窑瓷器，应该是开启乾隆皇帝视野，让他得以识别出汝窑产品的关键物证”。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开始赴汝州调查，新中国建立后，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诸先生和国内古陶瓷研究者爱好者也多次赴汝州考察，1987年最终确认传世汝窑瓷器的烧造地点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故宫博物院的吕成龙先生通过亲身经历，详细回顾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在1986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年会上，宝丰县瓷厂的王留现先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试论宝丰窑的历史成就和与汝窑的关系》，还向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展示了一件出土于宝丰县清凉寺附近的天青釉盘，他推论，“史称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其窑址有非常大的可能在宝丰的清凉寺瓷区内找到”。参加会议的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根据这一线索，立即派人于当年11月、12月两次赴宝丰清凉寺窑址作进一步调查，采集瓷片和窑具标本40余件，并于1987年10月编辑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断定“清凉寺窑即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官窑的故乡是确凿无疑的了”，正式宣告了汝窑遗址之谜的揭开。

1987至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清凉寺村窑址进行了8次考古发掘，出版了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汝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而在本次研讨会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的孙新民先生、郭木森先生、赵宏先生先后向我们介绍了近几年最新的考古成果。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清凉寺村居民住宅便道和院内进行试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御用天青釉汝瓷的中心烧造区，并于2000年至2002年对该区域（发掘报告中称Ⅳ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20座，作坊3座，储料陶瓮17个，过滤池、澄泥池、烧灰池各1个，水井3眼，灰坑44个以及一些其他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仅天青色汝瓷标本就多达50多万片。窑址出土了许多未见于传世汝窑瓷器的品种，在很多方面拓宽了以往对汝窑的认识。比如，出土了钵、方盘、酒台子、罍子、盖盒、熏炉、方壶、圆壶、梅瓶等不见于传世品的造型；出土了大钵、熏炉、梅瓶等体量较大的器物，改变了人“汝窑无大器”的看法；出土了一些以刻划花、印花、贴塑装饰的产品，丰富了汝窑瓷器的面貌。

孙新民先生从窑址出土的原料、窑具、窑炉等角度，关注了汝窑瓷器的制作和烧造工艺。他指出，与同时期其他瓷窑相比，御用汝瓷显示出独特的生产工艺，即范模成型，并以玛瑙入釉，先素烧、再釉烧。汝窑成熟期使用椭圆形小型窑炉，一般是两个窑并设，每窑装烧器物10件左右，以木柴做燃料；支烧具主要有垫饼和垫圈，垫饼较薄，支钉小而尖，饼面与支钉粘结性好，垫圈呈方棱圆形，圈面上有3—5个支钉；匣钵外多涂一层耐火泥以密封接口和保持匣钵内温度，烧窑过程中以火照测量窑内温度，重视火候和温度的控制。汝窑制作和烧造工艺之考究，更深刻地体现出其产品的特殊性。

2012至2015年，为配合汝窑遗址博物馆展厅建设工程，河南省文物研究院又在汝窑中心烧造区（Ⅳ区）外围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已揭露的主要遗迹有窑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水井和灰坑等，发现了大量素烧器和少量青釉瓷器残片。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明代窑炉，进一步丰富了清凉寺窑的研究内涵。郭木森和赵宏先生重点介绍了这些考古新成果，他们指出，与以往发掘不同的是，此区域出土的素

烧器占90%以上，与汝窑中心烧造区出土的成品器能完全对上号的极少。汝瓷成品器中最常见的器形如裹足洗、盘口折肩瓶、鬶子、熏炉、梅瓶等，在这批素烧器中未见或极少见；而素烧器中数量较多的仿青铜出戟瓶、四方委角盘以及大盘等，在汝窑的成品器中也未见。该区域出土的青釉瓷器不足10%，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坚实，釉面玻璃质感强，具有汝窑瓷器的因素，也有汝州张公巷窑产品的某些特点，暂称为“类汝瓷”。

两位考古工作者指出，在2000—2002年对汝窑中心烧造区的发掘中，出土遗物以成品器为主，约占99%以上，素烧器占不足1%，可复原者仅3件，器形是花口盆、花口盘和板沿洗，分别出现在汝窑成熟期地层和汝窑停烧前作坊的釉料坑内。而在2012—2015年的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素烧出戟瓶，但尚未发现有成品器。将这些素烧出戟瓶与南宋官窑出土的仿青铜类素烧器和模具比较可知，虽然器形有所差异，但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几乎完全一致，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继承或借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清凉寺窑Ⅳ区外围出土的仿青铜素烧器的年代不会早于北宋末年。另外，新出土的素烧器碗、盘类造型，与禹州神垕刘家门窑址北宋末年、汝州大峪东沟窑址金代的器物一致，同时伴随出土的还有白地黑花碗和黑釉凸线纹罐残片等，为其烧造年代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综上所述，发掘者初步推断这批素烧器中最早的年代可以到北宋末年，与御用汝瓷有关，而仿青铜素烧器和绝大多数与汝瓷无关的素烧器应主要为金代以后烧造，但也不排除其中包含有一定数量汝窑停烧前的产品。从考古学的地层叠压关系看，少量“类汝瓷”标本的年代晚于汝窑无疑，其造型、装饰以及烧成工艺都非常考究，这些器物的使用性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汝窑的性质及贡御时间

基于对北宋制瓷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同解读，关于汝窑的性质，学界长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汝窑就是北宋时期专门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官窑，即南宋《坦斋笔衡》中所说的北宋官窑，作坊性质与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官窑一样。另一种意见则采纳了南宋《清波杂志》的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认为汝窑是在烧造民用瓷基础上，因产品精良而被朝廷选中烧造御用瓷器的。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王团乐先生经考证后认为，北宋汝州为京师辅州，“京师自置窑烧造”系指朝廷在京师辅郡汝州青岭镇（现宝丰县大营镇）置窑烧造，而非狭义的京都、汴京之意。因此，汝窑即应是北宋官窑。韩国湖林博物馆李喜宽先生分析了土贡、购买、订购（“制样须索”）等北宋御用瓷器调拨的几种方式，建议在讨论汝窑属性时，“不必全然否定二元的御用瓷器生产体系”，因为“南宋时期就采用了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共存的御用瓷器二元生产体系”。北京大学的秦大树先生认为，在宋代制瓷手工业中所谓的“官窑”，系指官方掌控的制瓷手工业作坊。汝窑“是在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中政府的供送体系发生变化后，在接近都城附近的汝州，依托此前就形成的制瓷优势技术，以承包购买的方式建立的一个供宫廷和官府用瓷的窑场”。其产品由官府派人挑选出好的、合格的以供官用或宫廷用，而宫廷用瓷是由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六尚局”属官典御使去挑选。吉林省博物院的唐小轩先生通过对“汝州”、“汝窑”、“汝窑”三个概念的解读，提出汝窑的属性或可按其发展阶段来划分：“受命承烧”之前是民窑，哲宗年间（1086-1100）“受命承烧”后为贡窑，徽宗政和、宣和年间

(1111—1125)为官窑，后两个阶段也可称为地方官窑和中央官窑。虽然学界对“贡窑”、“官窑”等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汝窑生产与供应的官方背景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汝窑烧造御用天青釉瓷器的时间，以往笼统地认为是在北宋晚期，有学者推测大概有20或40年。发掘者将清凉寺村窑址Ⅳ区生产分为初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初期瓷器以青釉为主，还有少量白釉和黑釉，天青釉汝瓷极少，成熟期则以天青釉产品为主。秦大树先生认为，Ⅳ区初期阶段并不生产贡御用的“汝官窑”瓷器，只是生产发展到北宋晚期时窑业扩大，在窑址的北部边缘地区出现了新的制瓷作坊，“极少量”的天青色汝瓷，如果排除是发掘中扰入的晚期遗物，则有可能是新创制的产品，但还没有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因此，Ⅳ区成熟阶段才属于贡御用“汝官窑”瓷器的烧造时期，根据该地层最晚纪年器物“政和通宝”，应将其上限定为政和年间(1111—1118)。再参照《宋史》关于政和四年(1114)在汝蔡之间发现大规模玛瑙矿的记载，御用天青釉汝窑瓷器的生产时间可能是在政和四年(1114)至北宋灭亡(1127)的13年。

关于汝窑烧造御用瓷器的契机，李喜宽先生、吕成龙先生均对《坦斋笔衡》中“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早期定窑“芒”的出现是因为陶工为了给瓷器包镶金属釦而故意刮掉了口沿部位的釉料，这可能是高档定窑产品的装饰手段之一。大约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覆烧法的流行，不得不刮掉器物口沿的釉料，才出现了功能截然不同的芒口，“有芒”的定窑白瓷也渐渐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器物。但如果“只嫌定窑瓷器有‘芒’就弃之不用的话，作为权力至高无上的朝廷完全可以下令烧造无‘芒’的瓷器”。所以，北宋朝廷“弃定用汝”的原因或与宋徽宗赵佶的审美情趣有密切关系。深圳博物馆郭学雷先生还提出这可能与徽宗朝《政和五礼新仪》的颁行有关。他总结出此部新仪中有关茶的记录94处、有关酒的记录1361处、有关香的记录222处，这说明新礼仪主导下的宫廷生活需要大量的茶、酒、香等器具，恰巧与汝窑以茶、酒、香、花器用为主的特点相吻合。

四　汝窑瓷器的用途及定名

与会专家学者对2012—2015年大量出土的仿青铜素烧器的烧造目的颇为关注。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杜文先生认为，这些素烧器很可能不是青瓷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或称半成品，而是汝窑承制的特殊祭器。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建议在考虑此类器物的用途时，需要跟当时的礼制相结合，并将礼器与一般祭器、供器明确区分。他说若按官方祭器要求来衡量，汝窑这些形制的器物均不是当时正规祭祀场所配享的祭器。北宋汝窑烧造仿青铜器产品，可能并非出于礼制需要，而是迎合皇帝赏玩的需要。但金、元地层发现的素烧器，究竟是不是有意而为的礼制产品，还需要取决于对出土物的整理和研究。

上海博物馆的李仲谋先生通过将汝窑仿青铜素烧品与汉代青铜器实物及《重修宣和博古图》的比对，认为这类器物的烧造体现了北宋晚期的复古风尚。他说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期的祭器应以铜器为主，陶瓷器成为朝廷的主要礼器应是南宋绍兴年间以后，所以汝窑仿铜器产品是否作为朝廷礼仪用器而烧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他还依据文献记载和用途，对部分汝窑瓷器的定名加以考证。深圳博物馆的郭学雷先生将已知的汝窑瓷器分为香器、酒器、茶器、花器及食器等几大类，通过与古代文献和绘画的对比，分析其具

体用途和组合特点，并依照宋代习惯对其命名加以考证。

小林仁先生和杜文先生均关注了水仙盆的用途和定名。他们指出，将北宋汝窑那种椭圆形、带四足、腹壁稍深的浅盆造型称为水仙盆，可能是很晚的事情。从清代宫廷档案以及传世器物上题刻的乾隆御制诗看，至少在雍正、乾隆时期，这类器物被称为"猧食盆"或"猫食盆"，也曾出现过"腰圆笔洗"的称法。其实乾隆皇帝已意识到这种命名的不合理，反复在题诗中说水仙盆"便是讹传猧食器"，也不排除"猧食盆"后来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但可以肯定的是，清代对这种器形的名称及用途已经不甚了了，水仙盆更是后人的臆测。杜文先生认为椭圆形盘洗类在汝窑虽有烧制，但带四足的椭圆形水仙盆似乎与西周青铜盥造型也有相近之处。尽管西周青铜盥一般带双耳，不过从存世的元代大德盥（湖南省博物馆藏，浏阳文靖书院元代铜祭器）看，元代制作的仿古祭器铜盥已省去双耳，因此北宋时期有可能制作无耳的椭圆形铜盥。在崇古仿古之风盛行的北宋，汝窑水仙盆有可能是模仿铜盥造型。如此说成立，此种四足瓷盥可能是特殊造型和功能的食器、祭器。

五　汝窑与其他窑场的关系

对于2000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发现的张公巷窑，也有人曾提出它即"北宋官窑"，或认为其年代为金、元时期。上海博物馆对5件张公巷窑出土标本、5件清凉寺窑出土汝窑标本和4件传20世纪40年代在开封出土的标本用能谱仪进行无损成分分析，并采用热释光技术对张公巷窑和清凉寺窑标本进行年代测试。据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先生介绍，测试结果表明：第一，张公巷与清凉寺出土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有明显差别，二者不能归为同一类。第二，尽管从热释光年代测试上不能清晰地表现出清凉寺汝窑（在距今1045—1148年之间，平均为1112年）和张公巷窑（在距今1107—1194年之间，平均为1140年）相互之间的早晚关系，但是如果确认清凉寺汝窑瓷器的年代属于北宋，那么张公巷窑产品的年代也应该不会到金、元时期。第三，4件相传20世纪40年代开封出土的青瓷标本，从胎、釉及器形、工艺特点看与张公巷窑标本几乎一致；用能谱仪测试两者的胎釉成分，也几乎一致，热释光年代也相同。由此可见，它们应是产自张公巷窑。尽管热释光技术在测定年法上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古陶瓷研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堪称有益的尝试。

赵青云先生和闫全义先生特别关注了宋代汝州窑辖区内的其他窑场（即广义的汝窑）。赵青云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将这些瓷窑分为鲁山段店窑、临汝窑、汝州文庙窑、张公巷与东沟窑等五种不同类型，并提出"鲁山县段店村窑在唐代烧造的青瓷是汝瓷之源"的观点。闫全义先生统计了汝州辖区内已发现的瓷窑共计33处，其中已发掘的有宝丰县清凉寺窑、鲁山县段店窑、汝州严和店窑及东沟窑、张公巷窑、风穴寺窑等，待发掘的还有将台窑、文庙窑等。他将从这些窑址采集到的部分标本的照片进行了展示，指出它们的青瓷烧造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郭木森先生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鲁山段店窑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有极少量与清凉寺汝窑完全相同的标本。近年来收藏界也陆陆续续在段店窑址发现了一些天青釉标本，但数量不大，地层关系也不明确，是不是当时的鲁山段店窑也烧制御用汝瓷，有待进一步调查与研究。

早在20世纪中期，陈万里先生就曾提出汝窑烧造青瓷是受到唐至北宋浙江越窑青瓷的影响。此次研讨

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禚振西女士重点关注了耀州窑对汝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汝青瓷和贡汝青瓷两个方面。于民汝青瓷，从造型到刻花、印花装饰及窑炉烧成上均有表现；对贡汝青瓷，五代至宋初的耀州窑天青釉瓷与其传承关系更为明显。杜文先生也提到，耀州窑生产的动物形熏炉时间可能早于汝窑。

王团乐先生也认为高丽青瓷、钧釉瓷、越窑低岭头类型、龙泉窑、南宋官窑等均与汝窑工艺有传承关系。他说，汝窑窑工随宋室南迁后，主持或直接参与了越窑和龙泉窑宫廷专用瓷生产的产物，打破了南方青瓷的原有格局，从而影响改变了越窑和龙泉窑烧造工艺，完成了汝窑制瓷工艺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移植和交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的金英美女士介绍了一件1988年发现于济州岛三阳洞元堂峰元堂寺(现改称佛塔寺)的汝窑碗底标本，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高丽青瓷80件。她说，在济州岛的多处遗址都曾发现过中国瓷器，包括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同安窑等瓷窑产品，汝窑青瓷残片的出土还是首次。她分析了汝窑瓷器流入济州岛的两种可能：一是高丽王室对元堂寺的创建积极应对，以这种捷径来笼络附属高丽国的济州；另一种可能性是济州积极参加高丽王室的八关会与燃灯会，直接与宋商通过交易流入。

在谈到汝窑对后世瓷窑的影响时，耿东升先生、彭善国先生和上官敏女士分别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及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明清仿汝窑产品。耿东升先生认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仿烧宋代等诸多名窑的风气达到了高潮，并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仿汝釉围棋盖钵、牺耳尊和乾隆仿汝釉花囊、鸠耳尊、弦纹尊。彭善国先生介绍了成立于2013年的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该馆藏品中的一件观音瓶和一件双耳水丞可能是仿汝窑产品。上官敏女士在梳理了明清御厂遗址出土与传世资料以后，总结提出明清御窑仿烧汝窑的情况反映了宣德皇帝追慕宋代汉文化传统的心态和审美情趣，但其产品与北宋汝瓷还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台北鸿禧美术馆的舒佩琦女士对该馆收藏的清凉寺汝窑、张公巷窑、老虎洞窑以及明、清和现代仿汝窑瓷器进行显微观察，展示了其断面结构、釉面气泡、开片等特征，为进一步认识汝窑与其他瓷窑的关系提供了佐证。

最后，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先生对研讨会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说，汝窑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有关汝窑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指望召开一两次学术研讨会就能解决。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举办此次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汝窑研究方面给出一个助推力。他表示，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不断深入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逐步加强，笼罩在汝窑研究中的一层层神秘面纱必将被逐层揭开。(执笔：韩倩)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项坤鹏)